

海外视野

15 年来首次超越中国
印度成美国第一大留学来源国

■郭英剑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美国的第一大留学国。但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印度在美的留学生人数超过 32 万人，而中国持有学生签证的人数约为 25 万余人。尽管新学年美国向中国学生发放的签证数量有了大幅增加，但根据此次的调查数据，印度依然自 2009 年以来首次超越中国，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

据报道，在 5 月至 8 月这几个留学申请的关键月份，美国为中国发放的新学生(F-1)签证数量增加了 47%，这与 2022 年的情况相反。当年，中国的签证发放量在同时期大幅下降。据美国官方签证数据，今年夏季月份向中国留学生发放了近 7 万张签证，其中大部分为 F-1 签证；去年发给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只有约 4.7 万张。

尽管如此，今年中国留学生获得签证数量依旧落后于印度。美国向印度学生发放的签证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8.9 万张，这一数字比 2022 年同期的增加了 5%，比疫情之前的 2019 年同期增加了 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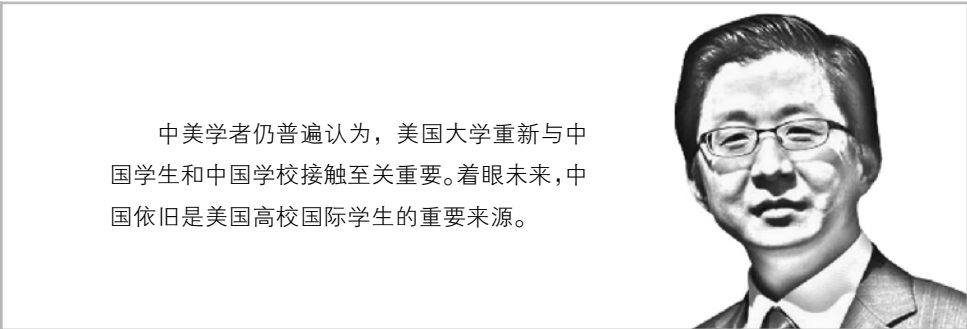
疫情后的变化

近期，《美国高等教育纪事》刊发文章对此作了分析，认为今年中国留学生签证的大幅增加令人欣慰。去年，当中国的签证发放量下降 45%时，许多国际招生专家都在怀疑，中美关系变化是否使得中国学生对美国产生了厌恶感。

美国阿默斯特学院招生副院长兼国际招生负责人万晓峰表示，签证数量的增加只是现行美中关系向好的一个方面。

他在跟踪调查了 80 多所中国高中的升学辅导员后，发现在高中 10 年级阶段（相当于中国的高一年级），为学生出国做准备的国际课程的人数要比高中最后一年做准备的学生高 25%。美国高中是四年制（9 年级到 12 年级），从 10 年级就开始准备，相当于提前了 3 年，预示着未来将有更多学生为出国留学做准备。

众所周知，在国内的国际学校或国际项目学习的学生，大都并不选择进入中国的高考体系。如此一来，这些学生也就不会在国内读大学。疫情期间，许多家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特别是出于对美国新冠疫情的处理方式感到不满，以及对疫情期间美国引发的反亚裔种族主义的震惊，不再选择国际学校或国际项目。如



中美学者仍普遍认为，美国大学重新与中国学生和中国学校接触至关重要。着眼未来，中国依旧是美国高校国际学生的重要来源。

今，疫情逐渐成为历史，人们又将出国留学作为可选择的道路之一了。

在接受采访时，清华附中副校长兼升学辅导主任王石曾谈到疫情期间我国留学工作遇到的难题。当时，很多在国际高中任教的外籍教师都离开了中国。同时，由于疫情原因，在应对对于大学录取至关重要的大学先修课程和 SAT 等重要考试时，学生也遇到了诸多困难。

“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也到了启动重置按钮的时候。”王石说。

中国留学生的阻力

尽管中国留美学生的人数有所恢复，但要想恢复到 15 年前的情景依然困难重重。

当时，中国留学生人数占据了美国校园中国留学生数量的 1/3，即便如今获得 F-1 签证的人数有了较大幅度增加，美国向中国留学生发放的签证数量仍远低于疫情前水平。

据有关学者分析，中国未来仍将是美国国际学生的重要来源，但不再是主要来源。在万晓峰的调查中，大多数的中国辅导员都表示，学生们对出国留学地的选择已经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很多人都申请了多个国家或境外地区的大学。换句话说，留学生的首选或许依旧是美国高校，但他们会有 B 计划和 C 计划。

也有专家认为，由于签证困难或出境困难等原因，目前很多学生不再申请美国高校，加之如果学生赴美是为了学习科技，或者为了具有更先进技术专业的话，其获得签证的可能性会更小，这致使很多优秀学生不再申请美国高校。

当然，正如一些专家所说，除了地缘政治及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外，人身安全也是中国父母的一大担忧。在国内外媒体上，人们经常看到美国各种社会安全问题的报道，这令很多中国家长感到不安，进而不再将美国作为第一选项，甚至不再考虑到美国留学。

除了上述原因外，中美之间的经济博弈所引发的外汇市场的不断变化，也使得留学美国的成本大幅上涨。

虽然如此，中美学者仍普遍认为，美国大学重新与中国学生和中国学校接触至关重要。着眼未来，中国依旧是美国高校国际学生的重要来源。

印度学生的留美势头能否持续

反观印度，去年是该国留美学生人数增长强劲的一年。而根据人们对其接近 9 万张签证发放量所进行的分析，印度学生对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兴趣上升最快，占据了印度留美学生人数的 3/4 以上。

尽管如此，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国际招生办主任韦勒依然表示，目前印度学生和家庭对本科学习的兴趣，要比 15 年前他刚刚从事招生工作时更浓厚。有关研究数据也表明，2021 年印度的本科生入学人数增加了 16%，这也为未来留学生人数的提高增加了更多可能性。

当然，印度留学生赴国外留学的势头得以维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该国青年人口的迅速增长。据报道，在印度的 14 亿人口中，年龄在 30 岁以下的人口占比超过 50%。但众所周知，印度的大学数量与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本国所需。

同时，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以及学生贷款的可用性和接受度的提高，也意味着更多印度家庭能负担国外留学的成本。

美国高校、社会与各种企业对印度学生有强大的吸引力，这也是印度留美学生数量增加的另一因素。

美国拥有许多世界顶尖大学，以及各种可供留学生选择的好学校，这自然会吸引广泛的学生群体。美国大学普遍比较重视对学生实习和工作的安置，这点对于印度学生来说颇具吸引力，也促使不少留学生不断寻找就业机会，发挥就业能力。

虽然美国不像许多竞争对手国家那样，为学生提供从学习到工作的明确途径，但毕业生还是可以通过可选实践培训(OPT)的计划获得在职培训。

OPT 计划于 1947 年推出，该计划允许学生保留学生签证，允许毕业生留在美国并工作至至少一年，攻读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课程的外国学生则可再延长两年。

据报道，与中国留学生相比，印度留学生更有可能以 OPT 的形式进入实习。2021 年，超过 1/3 的印度留学生签证持有者拥有 OPT 的机会，而中国留学生的这一比例仅为 18%。

印度在总体留学人数上领先于中国不仅反映在新生数量的增加，还反映在 OPT 的受欢迎程度上，其延长了印度学生在美的停留时间。

由此观之，媒体所得出的结论是——印度留学生赴美留学的兴趣或可持续，但也不敢断言，用谨慎的乐观态度表达或许更准确。

造成该结果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不确定的是美国政坛正在高校中发挥的更大作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国际学生的言论，以及其实施的更严格学生签证政策，不仅让中国学生，也让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国家留学生感到自己不受欢迎。这直接导致在他任上，印度的赴美留学生入学率有所下降。

中国留美学生不再是美国第一大留学生群体，这给很多美国大学的国际招生带来了压力。虽然印度人口众多，同时也是留美学生来源大国，但美国高校不敢把招生重心放在中印这样的大国上。美国很多高校正在拓展国际招生的多元化，从而保障未来拥有多元化的国际人才。

有感而发

近日，广东陆丰市教育局发布的一份“公费定向师范生违约人员名单”引发热议。名单显示，共有 5 名毕业生未履约。不仅是广东陆丰，广东雷州、福建莆田也发布了多份公费师范生违约处理决定书。

公费定向师范生是国家为精准补充乡村教师、优化教师资源配置的一项教师培养制度，意在缓解地域间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自 2007 年以来，6 所部属师范大学累计培养超过 12 万名国家公(免)费师范生，对加强中西部地区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体看，公费师范生违约者是少数，但这个“少数”却具有很强的刺痛感——国家资助下，公费师范生不仅享有各种学杂费减免政策，还能持续获得财政补助，毕业后直接取得相应编制……享受了优待，到该履约时却一拍屁股走人了，确实让大家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以契约精神而论，既然有约在先，就应认真遵守，岂能出尔反尔？对于违约者而言，赔付违约金是起码的代价，即便如此依然难辞其咎——毕竟违约行为浪费了宝贵的国家培养机会，辜负了偏远地区孩子们的期盼。

近年来，公费师范生违约频频发生，一些人俨然把读公费师范生当成一种投机——合则留，不合随时开溜，这一心态当然不可取。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公费师范生相继违约的背后，有一些共性原因。比如，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偏远农村地区教师待遇不尽如人意；比如，偏远地区农村中小学工作环境差，学校危房改造尚未彻底完成；再比如，尽管有“教师工资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原则性要求，但各地教师工资差别较大，有的地方拖欠教师工资的情况依然存在。凡此种种，无形中成了“吓退”公费师范生的一道坎。

条件差、待遇低当然不能作为违约的借口，但从长远看，靠外在的强制约束只是权宜之计，根本解决之道还在于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偏远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

近些年，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上，中央财政教育转移支付资金 80%以上用于中西部省份，重点提高农村学校办学水平。这些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离公众的预期还有距离，对优秀年轻人还不够有吸引力。以中央转移支付+地方严格配套+鼓励社会力量资助的“组合拳”，逐步实现中西部偏远地区教师收入等于乃至高于沿海地区、发达地区是理想目标。

由此而论，公费师范生违约风也是一个现实提醒。它提醒我们“打补丁”固然重要，讲情怀、讲奉献也永不过时，但努力解决待遇上的不平衡、不充分，破解偏远地区教师人才吸引力的不平衡不充分，进而逐步缩小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才是根本。

公费师范生违约风是现实提醒

■李思辉

智能养老是中国养老服务的必然选择

■张思锋 张泽浩

2000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8821 万，占总人口比例接近联合国 7%的老龄化社会标准。学术界将该年作为中国老龄化元年。20 多年来，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逐步形成。2021 年，全国 90% 以上的老人选择居家养老；建设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31.8 万个，床位 312.3 万张；建设提供住宿的养老机构 and 设施 35.8 万个，养老床位 815.9 万张。

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与面临的养老服务困境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走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复兴之路上，但我国也是当今世界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

2018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达 1.559 亿，占全球老龄人口的 23.01%；当年，印度老龄人口为 0.8354 亿，占全球 12.33%，位居第二。2022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2.098 亿，占全国人口的 14.9%。

养老服务是国家通过立法，在国民收入再分配和市场配置资源中，对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 的老龄人口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基本需求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否认的现实情况是，我国居家、社区、机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依然是“独生子女顾不上、放心保姆很难找、专业护工数量少、护理人员流动大”等人力资源短缺问题。

近些年来，大力发展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仍存在设施建设简陋、大部分养老机构入住率低的问题。很多养老机构(包括医养结合机构)硬件设施不健全，尤其是专业护理人员，如医生、护士、心理师，以及高素质管理人员短缺或缺失；相当多的养老机构因没有条件或不愿意接收失能老人、瘫痪孤独老人，将对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康复训练、心理慰藉有特别需求的老人拒之门外。

传统的“人养人”“点对点”养老服务方式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作内容“脏、累、险”，也是世界各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进程中遇到的普遍问题。

当前，中国养老服务面临的人力资源困境主要有三类。

一是家庭照料人力不断减少。据相关调查资料，中部某省南部农户进城购房比例过半，相当多的年轻人进城工作、生活，但一般只有孙辈在城市上学时，老年人才能随之进城。城乡分割的离散化家庭将农民就业、生活和养老空间分

离。随着乡村社会转型，农村公共文化和 社会舆论对老年人养老的支持功能弱化，子代家庭经济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挤压农村养老资源，内生养老秩序很难维系。

2010 年—2030 年，我国老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少儿人口的比例将从 1：4.36：1.58 变化为 1：2.31：0.91。老龄人口中，80 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数量将从 1347.98 万增加到 11343.19 万。

二是失能、半失能老人专业护理服务人员短缺。据全国老龄办等三部门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2020 年、2030 年和 2050 年，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将分别为 4200 万、6168 万和 9750 万。

在职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面对卧床不起的老人，很多子女会陷入“事业”与“孝顺”的角色冲突。可以说，在当今的社会市场生存压力下，大多数独生子女家庭及其组成的社会关系结构，使子女几乎没有为长期卧床的双亲提供亲自服务的条件。

近年来，实践过程和学术探索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只有为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周全的养老服务，老龄社会的关键问题才能解决，从而极大地促进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使人民群众过上康乐、幸福的生活。

三是尚未形成与养老服务行业共同成长的就业新业态。按照国家民政局基本建设标准，2020 年、2030 年和 2050 年，中国至少需要 1300 万、2056 万和 3250 万养老护理员。目前，医养结合机构的医护专业人员仅占 12.2%，其中研究生占 0.23%，本科生占 6.95%，中小學生占 70%。平均一名护工需要照看 5—6 名老年患者，白天、黑夜倒班，月工资 3000 多元，工作十分辛苦。一旦有其他收入高或负担轻的岗位，很多员工就会尽快离职。工作中也避免不了护理行为不规范问题。

伴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科技进步，依托互联网平台可实现就业，以及因科学技术水平提高、社会需求变动而形成的就业结构升级，逐渐出现了有别于传统稳定就业的新业态，使“人养人”“点对点”的居家、社区、机构传统养老服务就业迎来新曙光。

伴随新一代科技革命发展而出现的智能养老

第四次科学技术革命中，以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成为通用目的技术，集计算技术、控制技术、感应技术、动力技术、分析技术于一体，实现了人工智能系统替代部分人类脑力劳动。可以说，智能制造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也

是先进制造技术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贯穿于产品、制造、服务全生命周期的整个环节。

智慧养老强调的是“未来养老活动的构想、设计、方案”，而智能养老更强调将“未来养老活动的构想、设计、方案”付诸实践。《荀子·正名》有云：“知有所合谓之智”，即知觉与认识对象相符合为智；“能有所合谓之能”，即“智”需经过实践检验才为“能”。

我们在项目调研中发现，目前国内的智能养老模式还是以智能穿戴、远程监控等信息设备与技术为依托，面向独自居家或入驻机构的健康老人、半自理老人，集检测、报警、提醒、信息传递于一体的养老模式。这些智能养老措施一是提供老年人健康数据、远程紧急医疗救治信息、远程医务监护服务、活动轨迹查看分析、远程行为指导与紧急处置，以争取抢救时间；二是老年人居家或入驻机构，通过点击智能设备，在服务平台选择保洁、护理、外卖送餐、助浴、购药、缴费、陪医、陪购等服务项目；三是通过语音互助功能、互动信息交流等，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改善孤独、寂寞的状态。其基本定位在于面对人、养人的传统养老方式的功能延伸、作用强化、效率提高、意外减少等目标。

这些措施的终点或局限性仍在于需要人力服务，尚不能从根本上减少人力使用，实现人力替代。

2016 年，日本内阁会议制定的超智能社会 5.0 战略，提出注重运用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建设智能化、专业化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提升医疗与养老专业人员的社会人工智能技术的掌握能力，在国家科技战略中促进养老服务发展，与国家老龄化政策有序衔接；在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中，探索利用智能科技促进老年医疗护理服务的进步，促进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广泛应用。

2020 年，《美国老年人支持法案》提出了家庭照顾者支持计划，用科技手段促进老人护理评估工作效率的提高；同年，《疗养院紧急支援和老年人司法改革法案》提出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工作水平。

英国国家医疗和卫生服务管理部门于 2019 年推出的《长期发展计划》，对该国未来的国家医疗健康事业作出全面部署，建立智能医疗决策系统和利用智能预测技术提高护理服务质量。2021 年，英国《人工智能路线图》认为老龄人口增加引起人们对医疗、卫生护理方面的需求激增。政府要借助大数据技术对人工智能养老服务各参与方的行为进行实时监控。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传统医疗和养老服务工作水平是荷兰解决人口老龄化社会问题的

重要手段。该国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提出养老照顾、医疗护理技术性要求。2020 年，荷兰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提出“数字包容”概念，针对数字技能受限的老年人群在互联网服务中的诸多困境，通过数字授权提高老人网上活动的便捷度。

可以看出，在面临养老护理人员缺口的问题时，目前各国只能依靠修改用工政策和劳动就业法律，动员本国低中龄老人从事老龄人口的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等工作；在常年吸引外国劳动力从事本国的养老服务工作的同时，应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有效代替部分工作岗位。但少子化、老龄化社会必然使得大量护理岗位依托相对年轻的老人护理年龄更老的老人；尚未研发以智能制造提升养老服务、以机器人替代人力资源的全局性方案。

着力发展构建中国智能养老体系正当其时

着眼于中国养老服务的人力资源困境，通过挖掘人脑潜质，提高人类智力，开发千万亿倍的人工智能，必将引发人类生存技能的深刻变革。“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随着中国的少子化、老龄化与中国老龄化人力资源困境的先后到来，必须应用更高级的智能养老创造的更有效率的设备，以更高级的劳动生产率替代劳动效率不高的传统养老方式。

2021 年，我国智能制造装备市场规模达到 2.42 万亿元，2023 年的市场规模达到 2.97 万亿元。中国已连续 8 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消费国，2020 年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达 422.5 亿元，同比增长 18.9%；2021 年达 445.7 亿元；2023 年达 531 亿元，年均增长 0.095%。

在我国少子化、老龄化进程中，如果把智能养老发展作为摆脱人力资源困境的规划方案，必然使我国智能装备制造突飞猛进，为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作出更大贡献。

为此，应重点研究、开发、制造、推广有科技基础、成果支持、应用前景广阔的高档养老陪护机器人。如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上，我国推出六足滑雪、水陆两栖机器人，代替厨师、消毒、物流、咖啡与鸡尾酒调制及提供接待服务等机器人，具备人工智能监测功能的智能哨兵机器人也得到充分展示。

如果能将这些单一的高技术集聚到类人智能机器人身上，完全可以完成对大部分老人的护理任务。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开发研究、增加功能、精确制造，形成不断升级的养老陪护机器人系列。